腐败与文化的回归分析

孙敬良，梅 海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 借鉴经济学分析方法，认为文化虽然其本身是静态的，但不同的文化内核之间却存在着动态博弈，以 178 个国家清廉指数作为样本构筑腐败与文化价值内涵之间的回归模型，并对博弈模型中的假设进行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验证。结合我国实际，认为作为治理腐败的新路径，必须加强公民文化教育。

关键词： 腐败；国家清廉指数；文化价值；政府治理

中图分类号： G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0202(2015)02 - 0134 - 07

一、问题的提出

当下，中国正处在政治转型期，政治腐败成为实现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大阻力。如何治理腐败，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学界探讨的“显学”。

总体来看，学界对政治腐败研究的理论工具主要是功能主义路径和公共选择理论。20 世纪 60 至 80 年代文化主义和功能主义路径是解释政治发展中腐败成因、效应的主流理论[1]。但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公共选择理论开辟了从个体行动和激励机制角度来考察腐败产生的理论体系，代表性的研究方向有寻租理论和政府俘获理论，主要聚焦于政府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不合理干预和管制所导致的腐败。这些理论工具更多把治理腐败的途径指向政治制度设计和权力运作机制。从历史上看，许多社会都是在关于权力和正义等基础问题的争论过程中减少了腐败问题[2]，而非单纯反腐制度的革新。于是，超越了权力和制度的视角，学者们开始从文化的角度探讨腐败产生的原因。

1996 年，Tirole 在其腐败研究中引入了有关文化的变量，他将诚实与不诚实作为其关于腐败的分析模型中的重要指标[3]。而后，Duggar 将腐败划分为合作性文化对应的腐败和竞争性文化对应的腐败两类，分别从不同的文化根源上探讨腐败的产生[4]。Beker 等则通过对 123 个经济体的实证分析证实了区域政治文化对腐败的影响[5]。与此同时，有些学者在研究腐败与文化的时候却并没有找到腐败与文化的联系。Fisman 和 Miguel，在研究腐败与文化时，另辟蹊径，将腐败与各国外交官在纽约被开罚单数联系起来，认为腐败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母国形成的文化规范[6]。然而，当后来有学者将政府效率作为控制变量时，此时的罚单数与腐败并不能构成显著相关。相应的，Barr 和 Serra 的行为实验也表明，本科生腐败行为与母国文化有着极大的联系，而研究生则不然[7]。所以，有学者认为文化对腐败的解释是有选择的、迂回的，当用文化解释腐败这一类特定事情时，所谓的文化恰恰是根据其腐败行为判断出来的，或者说他们认为基于文化的制度改变了

收稿日期： 2015 - 03 - 11 **DOI：** 10.7671/j.issn.1672 - 0202.2015.02.0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09&ZD045）

作者简介： 孙敬良（1987—），男，河南许昌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家治理与基层民主转型。E-mail：150340334@qq.com

腐败,而非文化本身。为了使文化与腐败的探讨避免关于抽象化,这些年关于文化所包含的价值内涵与腐败的关系的讨论在学界一度盛行,很多文化的特定价值被用来解释各国的腐败。如 Knack 等研究政治信任与腐败的关系[8],而殖民传统、种族、宗教信仰等也皆在学者的研究中被证实了与腐败的联系。在关于文化与腐败的跨国回归模型中,Husted 分别从权力距离、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偏好、不确定性规避、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四个方面来建构文化对腐败的影响模型[9]。

但是,这些研究中主要存在几点问题:首先,文化下的单一维度内涵如宗教、语言等并没有具体揭示到底是何种价值对腐败有着影响[10]。以 Paldam 的研究为例,其得出了基督教新教地区腐败程度低,而天主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盛行地区腐败程度高,然而却并没有说明为什么基督教新教地区腐败程度就低呢? 到底是他们文化中的什么内涵造成的呢? 再者,关于文化的特定价值,数据往往来源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等一类调查报告,先不说这样的抽样信度,主要是这些调查数据的国家样本量很少,如在 Husted 的研究中一共只有 20 个国家样本量,而 fine 的回归分析中虽然涵盖了世界价值观调查的 6 万多个调查者的数据,但是国家样本也只有 27 个,对于一个腐败的跨国家分析,这样少的样本量在一般回归中是很没有说服力的。最后,在目前学界关于腐败与文化的研究中,文化往往被看作一种静态的事物,往往一经形成就不再改变,而根深蒂固的文化并不适合来解释一些治理腐败的成功,由此,我们不禁要问,文化只是一种静态的存在吗? 难道文化之间不会存在相互之间的博弈吗?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腐败的结果会导致两类人的产生,既得利益者和利益受损者,然而各种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是相同的吗? 一个人处于不同的位置,虽然价值观可能不会变化,但是影响其某个特定行为的文化则可能不尽相同。各种特定文化分别与腐败有何关系? 其中哪种文化对于腐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呢?

二、研究模型的建构及其量化

关于文化的内涵研究向来不受学者青睐。尤其是在政治学界,文化的研究似乎过于宽泛,过于模糊,所以很难引起学术界持续的关注。甚至有学者统计过作为比较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的领军杂志《世界政治》没有发表过一篇篇名中包含“文化”的文章[11]。所以,我们在此沿用了大多数学者使用的 Hofstede 的五维度文化模型[12]而非任何更新颖或更具说服力的文化内涵解构,但是,对于其中某些看法的出入,使我们将模型作了一些修改。在此,我们分别从权力距离、社会排斥[13](霍夫曼斯坦在此用不确定性规避,即对真实与稳定的认同,但是因为其与权利距离和集体与个人主义偏好之间存在极大的自相关,所以在此选用社会融合这一衡量指标,即判断社会文化是融合的还是排斥的)、个人主义偏好、男性主导程度、[14]文化远见五方面来探讨腐败与文化的关系。其具体界定如表 1。

表 1　霍夫斯坦德五维度模型概念界定表

	权力距离	文化融合	个人主义偏好	男性主导	文化远见
概念界定	一个国家中人们对于权力不平等的接受程度	一国国家中社会及文化的融合程度	一个国家中的人们对于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偏好	一个国家中的文化中男性主导的程度	一个国家中的人们富有远见的程度

权力距离:任何对现有秩序的挑战都有可能产生暴乱。所以对权力的容忍可能会带来权力的滥用。腐败作为一种权力行为,而对于权力不平等的忍受的文化也在助长腐败。这种文化直接体现在因腐败而受损者愿意容忍腐败的程度。

文化融合程度:文化融合程度即看社会、文化是融合的还是排斥的,关键即社会中人们获得平

等的各项权利、机会等,他的反面为社会排斥,长期失业率为衡量社会排斥的重要指标。文化的排斥,所以他们自身的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与此同时,长期失业往往也是脱离社会,形成社会排斥的重要原因。这样就造成了主流文化与各种亚文化之间的疏离。由此在腐败治理中及表现为文化疏离的地区,特定圈子中形成的亚文化可以近乎无视主流文化中的反腐价值。

个人主义偏好:通常情况下,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偏好使得腐败受损者更容易产生被剥夺感。

男性文化主导:相对而言,女性文化通常比较包容,而男性文化则通常比较强硬,在面对腐败行为需要承担的风险时,男性文化通常更愿意承担风险。

文化远见:远见通常是一个难以测量的事物,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行为来判断例如我们认为对教育的重视可以提现一个民族的远见,因为教育是很难有现期收益的,他必须要到很多年之后才可能会收回成本。我们认为一个重视教育的文化是富有远见的。越具有文化远见,其更容易发现腐败的远期危害,使得有权者不愿意腐败。

在此根据上述的文化分析提出五点文化假设:

H1:一国的权力距离越大其国内腐败越严重。一国的权力距离通过对权力的不平等的不接受指数这一指标来衡量。我们认为一国的公民对权力不平等的不接受程度越低则其权力距离越大。

H2:一国的文化融合程度越低其国内腐败越严重。一国的文化融合程度通过社会的长期失业率这一指标来衡量,我们认为一国的长期失业率与其社会文化的融合程度呈负相关。

H3:一国的文化越偏好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其国内腐败越严重。一国的文化个人主义偏好通过其对个人自由的重视程度这一指标来衡量,我们认为一国越重视个人自由意味着该国文化越偏好个人主义。

H4:一国的文化越是男性主导其国内的腐败越严重。一国的文化的男性主导则通过该国议会中的女性议员比例这一指标来测量,我们认为一国国会中的女性议员比例越高,其文化的男性主导程度越低。

H5:一国的文化越是短视而不富有远见其国内的腐败越严重。一国的文化远见则通过该国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我们认为教育支出占该国 GDP 的比重越大则该国的文化越富有远见。

与此同时,因为腐败不只是由文化所产生的固定状态,同时也可以看成是各种文化价值的博弈过程,首先腐败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类人的存在:一类为现期受益者,一类为现期受损者。而腐败与否则取决于两者间的博弈关系,我们假设腐败受益者因为腐败带来的现期收益的预期为 Gp,其因为腐败造成的未来预期损失为 Gf,镇压腐败的成本 Gc,镇压反抗者的意愿 Gw;而腐败受损者因为腐败受损的预期为 Ll,抵抗腐败的成本 Lc,以及对于腐败行为的容忍度为 Lt。同时将产生腐败这一事实记做 H0。表 2,便是关于腐败的博弈模型,那么文化在这个模型中有何影响呢?

表 2 关于腐败的博弈模型

	接受腐败	拒绝腐败
腐败现期获益者	Gp > Gf + Gc * Gw	Gp < Gf + Gc * Gw
腐败现期受损者	Ll < Lc/Lt	Ll > Lc/Lt

我们必须承认不同的人对于腐败的看法并不相同,尽管他们的文化是一致的,而且,不同的文化内涵对这两类人的影响程度也大相径庭,以文化远见为例。腐败的受益者如果具有一种长远的洞察力,他可能看到腐败可能会因此导致未来不受他人信任,而接受贿赂的政客,如果考虑更长期的未来,则有可能因为这件事失去未来的竞选,所以远见的文化使得他们在面对腐败时更多的考

虑将来,而腐败受损者的远见性在这里对他们的行为则不会造成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讨论五维度的文化变量时,我们分别将之对应腐败博弈过程中其最可能影响的环节。

如表 3,为关于文化影响腐败博弈进程的研究假设,对应关系均选取其影响最大的环节。“ + ”代表假设为正相关,“—”代表假设为负相关。因变量为一国的腐败程度。

表 3　文化的五维度与腐败博弈进程各环节的关系

	腐败现期受损者		腐败现期获益者	
	Lt	Ll	Gw	Gf
权力距离	+			
社会融合程度			—	
个人主义偏好		+		
男性主导			+	
文化远见				+

三、样本的界定及实证分析

(一)样本的界定

本文采用国家级的数据进行假设检验,包括 178 个国家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包括:透明国际、世界银行、经济学人智库、世界价值观调查,以及一些研究报告。因为都是公开发布的权威数据,所以数据的有效度和可信度较高。因变量的数据为 1995 年至 2012 年的各国清廉指数的均值,自变量考虑到因果滞后性,为 1994 年至 2011 年的均值。

因变量:数据采用 1995 – 2012 年 18 年的清廉指数,因为各年的数据非常平稳,所以在此采用 18 年的数据均值进行截面研究。与此同时因为其指标为满分为 10 的清廉程度,通过 10 – 清廉指数得到逆向数据,即为我们所需要的腐败程度数据来源:透明国际(TI)

自变量:对权力的不平等的不接受程度,包括社会共识和凝聚力程度、强人政治偏好等一系列指标,采用的是 2011 年数据,数据来源:经济学人智库和世界价值观调查报告。

长期失业率指持续失业一年或更长时间的失业者人数占失业者总人数的比重,采用的数据为 1993 – 2010 年的均值,数据来源:国际劳工组织的劳动力市场主要指标数据库。

个人自由重视程度包括对人权的尊重,对自由的偏爱等指标,采用的是 2011 年数据,数据来源:经济学人智库和世界价值观调查报告。

国会中的女性议员比例指妇女在上议院或下议院的议会席位占所有议会席位的比重,数据为 1997 到 2012 年 16 年的均值,数据来源:各国议会联盟(IPU)

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重,教育支出包括教育公共开支由教育方面的公共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支出构成,包括政府在教育机构(公立和私立)、教育管理以及私人实体(学生/家庭和其它私人实体)补贴方面的支出。采用数据为 1993 年 – 2010 年 18 年数据的均值。数据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统计研究所。

在分析中,我们控制了一些变量,防止他们对结果进行干扰。一、文中控制了各国的经济总量,因为各国的经济总量存在很大的差异,我们要控制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对腐败产生的影响。采用 1994 – 2011 年 18 年间各国的平均 GDP 总量作为衡量指标,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文件。二、文中控制了各国的人口规模,因为各国人口数存在较大差异,我们控制人口数以控制因为人口规模这种国家的天然条件对因变量的影

响。采用1994－2011年18年间各国的平均人口总数作为衡量指标,数据来源:联合国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人口普查报告及其他国民统计刊物 。

(二)实证分析

我们分别从权力距离、社会融合程度、个人主义偏好、男性主导程度、文化远见五个方面进行线性回归,并将他们同时作为指标放入第六个模型中,对腐败与文化这一指标体系进行回归分析,以确定腐败与文化的整体性关系。

表4 腐败与文化的回归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常量	11.339	2.627	8.428	7.259	6.995	11.313
	(30.374)	(4.394)	(24.080)	(27.153)	(17.351)	(12.910)
人口数	1.168E－9	4.298E－8	3.091E－9	2.498E－9	2.129E－9	4.725E－9
	(1.453)	(3.611)	(2.912)	(2.240)	(1.766)	(0.595)
GDP	－2.483E－13	－1.338E－12	－5.232E－13	－6.462E－13	－6.473E－13	－2.210E－13
	(－2.223)	(－3.845)	(－3.619)	(－4.298)	(－4.033)	(－0.941)
对权力不平等	－0.956					－1.114
的不接受程度	(－14.708)					(－8.064)
长期失业率		0.038				－0.011
		(2.877)				(－1.146)
个人自由			－0.384			0.152
的重视程度			(－7.370)			(1.719)
国会中的				－0.083		－0.033
女性议员比例				(－5.335)		(－1.659)
教育支出					－0.233	0.042
占GDP比重					(－2.890)	(0.295)
样本数据	161	62	159	175	168	56
R方	0.623	0.272	0.337	0.228	0.140	0.780
经调整后的R^2	0.615	0.235	0.325	0.214	0.124	0.748
F值	86.889	7.358	26.467	16.898	8.920	24.757

注:模型分别对应不同的文化维度(1)——(5)分别对应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偏好、男性主导程度、文化远见(6)所有文化变量的总体回归。无括号的为标准系数,括号中为t统计值;

图1中展示了回归分析的结果,通过观察,我们发现,所有单一模型的计量结果全部都符合原假设。其中权力距离这一指标具有最高的解释力,而文化远见即教育支付占GDP比重解释力最弱,但是也通过了置信空间为0.01的显著性检验。与此同时,文化的总体模型r方达到了0.78,说明文化对于腐败的解释力,在计量上得到了很好的证明。但是,我们发现在所有变量加总的文化总体模型中,一些变量的关系则并不像我们原先预期的那样。如对个人主义偏好、文化远见等我们假设的结论相反,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单独作用的文化和共同作用的文化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出文化不单是一种静态的特征,他伴随着与腐败相关的博弈主体的选择过程,而在此期间文化的不同价值对他们的影响时不一样的。

对此根据上文的假设,我们重新更新了模型。

表 5　腐败博弈与文化的回归分析

变量	(a)	(b)	(c)	(d)	(e)(f)	
常量	11.339	8.428	4.952	6.995	11.472	6.250
	(30.374)	(24.080)	(6.038)	(17.351)	(30.511)	(6.048)
人口数	1.168E－9	3.091E－9	3.754E－8	2.129E－9	1.471E－9	3.447E－8
	(1.453)	(2.912)	(3.438)	(1.766)	(1.831)	(3.191)
GDP	－2.483E－13	－5.232E－13	－1.255E－12	－6.473E－13	－2.438E－13	－1.162E－12
	(－2.223)	(－3.619)	(－3.956)	(－4.033)	(－2.206)	(－3.703)
对权力不平等	－0.956				－0.853	
的不接受程度	(－14.708)				(－11.236)	
长期失业率			0.024			0.023
			(1.808)			(1.777)
个人自由		－0.384			－0.114	
的重视程度		(－7.370)			(－2.510)	
国会中的			－0.092			－0.066
女性议员比例			(－3.734)			(－2.492)
教育支出				－0.233		－0.357
占 GDP 比重				(－2.890)		(1.938)
样本数据	161	159	61	168	159	60
R 方	0.623	0.337	0.405	0.140	0.635	0.445
经调整后的 R^2	0.615	0.325	0.363	0.124	0.625	0.395
F 值	86.889	26.467	9.683	8.920	67.346	8.820

注：模型分别对应不同的博弈环节(a)对应对腐败行为的容忍度，(b)对应因为腐败造成的损失预期，(c)对应镇压腐败者的意愿，(d)对应未来造成的损失的预期，(e)对应腐败现期受损者模型，(f)对应腐败既得利益者模型

无括号的为标准系数，括号中为 t 统计值；

当我们将腐败作为一个博弈过程时，所有的假设都得到了证实，与此同时，当我们将之用腐败既得利益者和腐败利益受损者分别进行建模分析时，回归结果也与原假设相符，且没有出现原先的相关性相悖的情况。观察腐败既得利益者和腐败利益受损者两个模型时，我们发现影响腐败利益受损者的文化更能影响一国的腐败程度，而其中对于腐败的容忍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相对而言，腐败既得利益者的影响文化对一国的腐败程度影响则比较小。所以我们认为一国的腐败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腐败利益受损者的态度，当一国腐败的利益受损者过度容忍，且忽视个人权利时，高层从上而下推行的腐败治理是很难收到效果的。

四、结论

目前，腐败的制度成因依然是学界腐败研究的热点，而关于腐败的文化解释则乏人问津，但这并未抹煞腐败与文化之间的关联。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恰恰证明了文化与腐败之间极其强烈的相关性。同时，借用来自经济学人智库的问卷等数据，我们可以将抽象的文化量化，通过 178 个国家的大样本回归，证实了腐败与文化的关系，不只是一种我们自身经验的感知，其更是在统计学层面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结论。更为重要的是，在文中，我们的模型有力地支撑了文化的博弈进程，即文化的各种价值内涵之间本身是出于一种竞争关系，而非固定不变，腐败的产生并不固化与某种特定文化，而是价值内涵选择博弈的结果。

与此同时，文中发现对于腐败受损者有着重要影响的文化如对权力不平等的容忍等对一国的腐败程度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联系当前我国的反腐实际，我们认为中国未来的反腐不能仅仅只

靠高层凭着远见卓识自上而下的"打老虎,打苍蝇",也不能从党和政府的反腐机制完善上得到根治,更应该从公民文化入手,培养人民对自身权利的重视,树立权利意识,拒绝忍受权力不平等带来的伤害,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

参考文献:

[1]燕继荣. 发展政治学:政治发展研究的概念与理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54.
[2]Glaeser E L, Saks R E. corruption in America[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6, 90,(6): 1053 - 1072.
[3]Jean · Tirole. 1996. A Theory of Collective Reputations(with Applications to the Persistence of Coruption and to Firm Quality)[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63,No. 1(Jan. ,1996),1 - 22.
[4]Duggar E, Duggar M. Corruption,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al form[J]. Available at SSRN 770889, 2004.
[5]Becker S O, Egger P H, Seidel T. Common political culture: Evidence on regional corruption contagion[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9, 25,(3): 300 - 310.
[6]Fisman R, Miguel E. Cultures of corruption: Evidence from diplomatic parking tickets[M].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6.
[7]Barr A, Serra D. Corruption and culture: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0, 94,(11): 862 - 869.
[8]Zak P J, Knack S. Trust and growth[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1, 111,(470): 295 - 321.
[9]Husted B W, Instituto Tecnologico y de Estudios. Wealth, culture, and corruptio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9: 339 - 359.
[10]Paldam M. The cross-country pattern of corruption: economics, culture and the seesaw dynamics[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2, 18,(2): 215 - 240.
[11]徐 静. 西方学界关于腐败成因的文化解释[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2,(6): 022.
[12]彼得卡赞斯坦. 多元多维文明构成的世界[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11):36. .
[13]Hofstede G, Hofstede G J, Minkov M.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M]. London: McGraw-Hill, 1991:163.
[14](美)卡莱斯 · 鲍什. 民主与在分配[M]. 熊 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65.
[15]王一江. 影响腐败程度的权力和个人因素[J]. 经济科学,2008,(2): 10.

Regression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 of Cultural and Corruption

SUN Jing-liang, MEI Hai
(*Institute of China Rural Studi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d process of game playing between corruption and culture value choice by setting up an analytic model in terms of power distance, culture integration, individualititc preference, male-dominated and cultural planning with regression analysis on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of 178 stat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strong relativity exists between culture and corrup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civic culture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e civic education to combat corruption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corruption;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cultural value; governmental management